



故王杰教授遺影。

鞠躬盡瘁 死而後已

紀念王杰先生逝世兩週年

胡久明

光陰荏苒，王杰先生離開我們已經兩年了。然而，王杰先生對事業執著追求的精神和求真務實的品格，却永遠留在我們的記憶之中，激勵我們為祖國的繁榮富強而奮鬥不息。值此王杰先生逝世兩週年之際，特撰寫此文以寄托我們的懷念之情。

報效祖國 投身考古事業

理想信念是有所追求的人們心中的太陽，只要樹立起遠大的理想信念，人們的窗就會灑滿金色的陽光。考古是一項既艱苦又崇高的事業，王杰先生一步入社會，就立志

獻身於祖國的考古事業，貢獻出了自己畢生的知識、智慧和精力。王杰先生於一九三四年七月出生在天津寶坻一個農民家庭。一九五〇年到北京求學，一九五五年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實習員，同年參加



王杰教授與旅台考古名家李鑑瑞鄉親交換龍碑發掘出土文物心得。

了由北京大學、國家文物局和考古研究所共同舉辦的全國考古培訓班第三屆學員班學習。一九五六年王杰先生到西安禮西，參加了西周古墓的發掘。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王杰先生參加了舉世聞名的明定陵考古發掘，從而成爲新中國成立後較早的一批考古專家之一。從此開始，王杰先生先後參加了湖北、陝西、青海、山東、河南等地的田野考古工作，大江南北留下了王杰辛勤工作的足跡。他作爲考古研究所長江考古隊成員，長期致力於湖北漢江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先後參加了湖北省鄭縣青龍泉和大寺遺址、技江關廟山遺址和均縣朱家台遺址的發掘，作出了他應有的貢獻。

王杰先生在考古發掘的過程中，勤於思索，並將思索的問題加以歸納整理，發表於報刊。他先後撰寫了《對大溪文化中幾個問題的探討》、《屈家嶺文化與大溪文化關係問題》、《論大溪文化與其它文化之關係》、《試論大溪文化的發展和社會形態》、《大溪文化的農業》、《試析卡約文化的經濟形態》、《屈家嶺文化人的飲食生活》和《柳灣墓地中的三個

問題》等文章在《漢江考古》、《考古》和《中國烹飪》等刊物上發表，使他在考古工作中逐漸從感性走向理性，逐步走向成熟。

傾情雕龍碑 鑄就考古輝煌

遠大的志向，是人生的羅盤針，是人生的牽動力，是走向成功的催化劑；崇高的志向，可以點燃人們追求美好明天的心靈之燈，激發人們執著追求的信心與勇氣。上世紀八十年代，王杰先生轉戰山東，參加曲阜一帶遺址的考古發掘工作。從一九九〇年起，王杰先生重回湖北，領導考古隊開展了舉世注目的棗陽雕龍碑遺址的考古發掘工作，至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廿七日王杰先生辭世的十八年間，他把後半生獻給了棗陽雕龍碑遺址的發掘、保護、研究及「雕龍碑文化」的探討定位工作，他的奉獻精神，不屈不撓的品格，贏得了人們的尊敬和愛戴。

雕龍碑遺址位於棗陽鹿頭鎮北三公里，是

距今四八〇〇～六三〇〇年間新石器時代原始社會農耕經濟階段氏族聚落遺址。該遺址是在一九五七年文物普查時被發現，一九八四年六月我主持召開的全市文物工作會議上決定，將棗陽雕龍碑公布為市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王杰先生具有犀利的眼光，認識到棗陽雕龍碑遺址的重要性，於是，自一九九〇年春至一九九二年秋，王杰先生帶領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考古隊，先後對棗陽雕龍碑遺址，進行了五次發掘。責任感點燃探尋真知的不滅火焰；事業心掛起追求成就的不落征帆。王杰先生在考古發掘中，獲得了多項重要新發現。該遺址共有五萬平方米，已發掘一五〇〇〇平方米。雕龍碑遺址有與其他文化不同的葬俗，葬具皆為夾砂灰陶，首次發現這種統一使用同一種形製的葬具；首次發現年代最早的人工燒製的石灰；首次發現年代最早的類似現代水泥的混凝土；首次發現年代最早的推拉門；首次發現年代最早的房屋壁龕；首次發現單元多室並採用加工精細、稜角清晰規整的房屋木骨架，



教王同（右）邱市長光秀（左）與陳列室教授仁湘教授（中）在雕龍碑發掘出土物陳列室交換意見。

加上塗泥燒成牆體屋頂爲一整體的似磚的住房；發掘出眾多而具有創新意味的彩陶。雕龍碑遺址文化處於同時文化的領先地位，反映了該地經濟文化最高度發展的水平。在雕龍碑遺址發掘和研

究的過程中，我幾次受到襄陽市委領導的邀請，到雕龍碑遺址現場去參觀考察，並與王杰先生相識，我

們談體會，交流思想，從而建立了友誼關係。

由於雕龍碑遺址具有很高的古代文化品位，在襄樊市政府一九八四年列爲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基礎上，一九九三年湖北省政府公布爲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一九九六年國務院公布爲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長期的田野考古發掘，需要堅韌的秉性，要耐得住寂寞。耐得寂寞，是勤奮，是毅力，是追求。只有耐得寂寞，才能始終如一地、專心致志地完成所追求的事業。王杰先生在雕龍碑遺址考古發掘的過程中，身先士卒，率先垂範，吃苦耐勞，做出了表率。考古發掘生活條件很艱苦，王杰先生作爲領隊不搞特殊化，同考古隊員一起擠在一間民房。吃飯時，他總是主動把營養好的菜勻給年輕的隊員，一再說年輕人正在長身體，需要增加營養。王杰先生作爲考古領隊，既注意搞好內部管理，又注意搞好外部協調；既關注年輕人成長，又關心改善考古隊工作、生活條件。白天，他帶頭在工地上發掘，並統籌安排各項工

作，耐心指導年輕隊員，檢查巡視各工地，關注發掘進程；晚上，他抓緊記好考古日記，並對出土文物進行整理，作對比研究。有一年天氣真怪，四月天氣，中午氣溫達到三十多度，可是夜晚又飄起雪花來。忽冷忽熱的天氣，有的年輕隊員病了發燒，掛吊瓶，但是王杰先生爲了趕進度，堅持在工地上發掘。有一次，村裡幾個不懷好意的年輕人，趁考古人員吃飯的機會，跑到工地踢壞了發掘出來的房屋牆體，破壞出土文物，王杰先生聽說後放下飯碗趕到工地，看到被破壞的文物既心痛又非常氣憤，當即向鹿頭鎮有關負責人匯報情況，請求認真處理好此事。因而引起棗陽市委、市政府領導的高度重視，當即召開緊急會議，部署了考古工地的安全保衛工作，防止了類似事件的再次發生。王杰先生關心年輕考古人員的成長，除親自傳授考古發掘知識以外，還選派人員到西安半坡遺址、河南澠池仰韶遺址和河南安陽殷墟遺址，學習考古技能，請半坡遺址博物館幫助培訓講解員。爲了有力地推動雕龍碑

遺址的發掘工作，王杰先生多次向鹿頭鎮、棗陽市、襄樊市和湖北省有關領導匯報考古發掘成果，宣傳雕龍碑遺址發掘的重要意義，引起了各級政府的重視，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六年間投資數百萬元，建成了數千平方米面積，具有展示雕龍碑遺址文物功能的展示廳、展覽室，配備了文物管理人員，成立了文物管理處，使出土文物得到了妥善保護與利用，發揮了積極效應，並使雕龍碑遺址入選全國一百名大遺址保護項目。

一個人樹立奮鬥目標並不難，難的是能否鍥而不捨，一以貫之地去堅持。王杰先生向著考古發掘的高峰攀登，持之以恆地去探索雕龍碑遺址蘊藏的豐富內涵，先生在《江漢考古》、《考古》、《炎黃》、《中國考古年鑒》、《華中建築》、《文物天地》、《民族文化》、《光明日報》和《中國文物報》等報刊上發表了《湖北棗陽雕龍碑遺址的考古收獲》、《史前考古學與傳說時代——雕龍碑考古發現和炎黃文化》、《雕龍碑文化的大型房屋建築》、《史前建築的發

現：《推拉式屋門》和《探尋炎帝民族的足跡——從雕龍碑考古發現探討炎帝的問題》等十幾篇文章。經過深思熟慮，王杰先生提出了「雕龍碑文化」的論點，以及雕龍碑遺址是炎黃神農氏都城的構想，為雕龍碑遺址文化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雕龍碑遺址發掘以後的十幾年間，尚未召開全國性的權威專家論證會，未給雕龍碑遺址文化及時定位。王杰先生為此十分掛心，我獲悉後，曾於二〇〇二年四月中旬專程前往雕龍碑文物處與王杰先生商議兩件事：一是關於召開雕龍碑文化專家論證會有關事宜的籌備問題；二是將雕龍碑遺址作成研究炎黃文化支撐點，並擬聘他任顧問。襄樊市炎黃文化研究會於二〇〇二年六月廿八日成立，我擔任會長，會上正式聘請王杰先生為顧問，並把雕龍碑遺址文化當作研究會的重要研究支撐點。我和丁寶齋同志撰寫了《炎帝神農時代與雕龍碑遺址文化》的論文，作為襄樊市炎黃文化研究會進行論文交流的開篇之作，並在會刊上發表。我按照王杰先生的願望就

商定召開一個全國性有權威的研究會，邀請國內外資深專家對雕龍碑遺址文化進行論證定位。經我們積極運籌，商請襄樊市、棗陽市兩級政府及其主管部門同意，由襄樊市政府行文，於二〇〇二年九月十一日正式成立了「襄樊市棗陽雕龍碑遺址文化論證及遺址利用研討籌備委員會」，並任命我擔任籌委會主任委員，襄樊市副市長曹敬蘭、襄樊市政協原常務副主席李文烈等九位同志任副主任委員，特聘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館員、雕龍碑遺址發掘主持人王杰先生擔任顧問。王杰先生對我運籌此舉，非常高興，認為實現他多年夢寐以求的「雕龍碑文化」論證定位的一天指日可待了。他決心盡職盡責，矢志不移，參與研究、論證「雕龍碑文化」的一切籌備工作。四年來，我主持在棗陽鹿頭鎮文物處召開了五次籌備會，王杰先生都冒著嚴寒酷暑，從北京來到棗陽，參加了籌備工作會議，參與三次修改籌備方案和邀請國內外專家名單方案，參與繪製了「發掘清理的每一位房屋建築基礎圖」、



王杰教授（左二）在雕龍碑標誌前與第二期發掘的工作人員合影。

「雕龍碑遺址周邊毗鄰地區新石器時代遺址分布圖」、「雕龍碑遺址文化和其他文化關係圖」和

「雕龍碑遺址的位置及生態環境素描圖」。在籌備過程中最難的是關於《棗陽雕龍碑發掘報告》和《雕龍碑史前彩陶》兩本書的出版問題。特別是《棗陽雕龍碑發掘報告》不出版，就無法召開《棗陽雕龍碑文化》論證會。因為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要出版的報告有二十多部不易排上隊，為此我曾先後四次專程赴北京同王杰先生一起到考古所拜訪所長、書記和有關處室負責人，要求早日安排出版，為早日召開會議創造條件。由於二〇〇三年發生「非典」打亂了部署，二〇〇四年安排審查完善發掘報告，擬於二〇〇五年正式安排出版印刷，這樣我和王杰先生四次拜訪成行。雕龍碑遺址出土的史前彩陶多而且先進，僅此一處所出土的彩陶比河南全省出土的彩陶還多。為此，王杰先生又向我提出建議，由我主持以襄樊市炎黃文化研究會名義出版《雕龍碑史前彩陶》一書，作為《雕龍碑發掘報告》的姊妹篇，這部分有很高的歷史價值。我當即答應承擔投資運作。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中旬，王杰先生邀請王仁

湘教授一同從北京來到雕龍碑遺址，他們冒著大雪嚴寒，歷時一週進行整理，拍攝資料，於二〇〇四年四月形成初稿，並擬定了出版有關方案。我專程赴北京與王杰先生商定完全由我負責籌集該書攝製出版的全部費用。二〇〇六年三月中旬，《雕龍碑史前彩陶》在北京印刷出版，我將該書送到王杰先生家中，並看望他的病情，他十分高興。同年四月中旬《棗陽雕龍碑發掘報告》正式出版。由於這兩本書的適時出版，為召開雕龍碑文化研討會創造了主導條件。

「中國·棗陽雕龍碑文化研討會」於二〇〇六年五月廿四日至廿五日在湖北棗陽市召開。襄樊市副市長曹敬蘭、襄樊市政協原常務副主席李文烈、棗陽市委書記岳興平、市長汪厚安，棗陽市人大、政協領導，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湖北省文物局，襄樊市、棗陽市文化等有關部門領導到會祝賀。我在會上作了「弘揚歷史文化，振興中華民族」的會議籌備工作情況報告。研討會由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故宮博

物院原院長、史前考古專家、教授、博士生導師張忠培主持。出席研討會的專家、學者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邊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王仁湘，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黃衛東，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長、研究員、半坡遺址發掘主持人石興邦，武漢大學考古系教授方酉生，《華中建築》主編、研究員高介華，湖北省文物局文物處長、研究員祝建華，湖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孟華平，荊州博物館研究員張緒球，湖北省旅台同鄉會理事長、《棗陽文獻社》主委李發強，棗陽旅台考古專家李鑑瑞，台灣《前峰日報》前峰新聞通訊社社長胡耀坤和台灣考古專家張驥、陳玲美女士、來賓李萬鈞等台灣來賓共五十六人。黃衛東副研究員代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會上作了「雕龍碑遺址局部發掘研究成果報告」，王仁湘研究員作了「史前雕龍碑彩陶藝術」的專題報告。王杰先生因病未能赴會，向研討會遞交了《超前的智慧，文明的見證——淺析雕龍碑史前聚落的民居建

築》的論文，並向大會致信。與會專家考察了龍碑遺址，進行了充分的學術研討會論證。他們認為龍龍碑遺址的考古發現當屬我國二十世紀的重大考古發現，彌足珍貴，是我國考古事業中的一座豐碑。龍龍碑文化是其他文化不可替代的獨特文化，不同凡格的文化在這裡相聚、融合，從而形成了龍龍碑遺址自身獨特的文人內涵。專家們一致認為，棗陽龍龍碑遺址文化應與我國馳名的仰韶文化、大溪文化、龍山文化齊名，從而定位為「龍龍碑文化」。《人民政協報》、《襄樊日報》、《光明日報》、《湖北日報》、湖北電台、《襄樊日報》、《襄樊晚報》和襄樊電視台等多家媒體以及《華中建築》、台灣《棗陽文獻》等刊物都對龍龍碑文化研究會作了報導。王杰先生在北京欣聞「棗陽龍龍碑文化」得到眾多專家贊同、認定，使「棗陽龍龍碑文化」正式定名，使他感到由他主持發掘的龍龍碑遺址文化的論證工作，劃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實現了自己的宏願，感到由衷的欣慰。

湖北省炎黃文化研究會二〇〇九年學術研討會在炎帝神農故里湖北省隨州市召開，我與會遞交了題為《繼承優秀文化，弘揚炎黃精神——回憶召開「中國·棗陽龍龍碑文化研討會」的意義》的論文，闡述了「中國棗陽龍龍碑文化研討會」的成功召開，既有其重要的歷史學術研究價值，又有其深遠的現時意義。會議的籌備有效地推動了《棗陽龍龍碑》和《龍龍碑史前彩陶》兩本書的出版；會議確認了「棗陽龍龍碑文化」的定位，會議對龍龍碑文化與周嶺史前文化的關係進行了深入研究與對比，一致認為「棗陽龍龍碑文化」是周嶺其他文化不可代替的一種獨具自身特色的文化；會議認為棗陽龍龍碑遺址考古發現，當屬我國二十世紀重大考古成果，有著獨特的文化現象和重要學術研究價值，是一處不可多得的國寶，要加強保護和利用。「中國·棗陽龍龍碑文化研討會」的成功召開，進一步揭開了炎帝神農時代的輝煌。龍龍碑遺址的發掘為我們了解和研究炎帝神農時期的歷史，提供了實物的證據。

鞠躬盡瘁 死而後已

二〇〇五年末，王杰先生參加棗陽雕龍碑遺址文化論證籌委會會議之後，於十二月廿六日乘火車返回北京。由於風寒侵襲，王杰先生身染重疾，久咳不止。經多家醫院檢查，確診為淋巴瘤。醫生斷言，他只有四個月的生命期。但是，王杰先生以驚人的毅力與病魔抗爭，配合醫生積極治療，竟存活了二十個月。他在北京協和醫院住院治療，每月化療一次，因化療反應，他的頭髮掉完了，免疫力迅速降低，臉色蒼白，路也走不動了，每天靠喝稀米粥度日。王杰先生雖然遭受癌症的煎熬，但他仍然不忘雕龍碑文化的論證工作，乃然不忘沒有完成的研究有關課題，仍然竭盡全力撰寫《雕龍碑遺址與雕龍碑文化》的絕世之作。二〇〇七年，根據王杰先生的要求，我派襄樊市政協原常務副主席李文烈同志代表我，並建議棗陽市文體局派棗陽雕龍碑文物管理處主任鮑明長一起赴北京，看望王杰先生的病情後，

將鮑明長同志留在北京幫助王杰先生整理文稿。王杰先生病體非常虛弱，已不能寫字了，他口述讓他老伴苗茜和鮑明長整理，由苗茜代寫，鮑明長譽正後，再經王杰先生審查修改。經過他艱苦的努力，一篇近五萬字的題為《雕龍碑遺址與雕龍碑文化——探尋雕龍碑文化發展變化歷程》的論文終於完成，這篇論文共分五章十二節，從雕龍碑遺址地理自然環境分析、雕龍碑文化的發現與發展變化、雕龍碑文化同周邊其他文化的關係及雕龍碑文化在文化交流發展中的作用等各個方面展開論述，深層次地分析論證了雕龍碑文化的發展變化歷程與軌跡，闡述了雕龍碑遺址在史前考古學文化研究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王杰先生於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中旬在病床上仍堅持修改文章，定稿不到半個月，於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廿七日與世長辭，享年七十三歲。噩耗傳來，我們襄樊、棗陽所有與土杰先生有過交往的同志都深感萬分悲痛和懷念。

王杰先生患病治療期間，得到了中國社會科



王杰教授與夫人苗苗教授在襄樊市「米氏故里」前合影。

王杰先生。襄樊市政協原常務副主席、棗陽離龍碑文化研討籌委會副主任李文烈先後代表我兩次到北京慰問探視王杰先生。在棗陽召開研討會期

學院考古研究所領導和同事們真誠的關懷。襄樊市、棗陽市的有關領導和文物部門的同志多次專程赴北京慰問王杰先生。我也專程赴北京看望

間，我曾向我的老同學名考古家、棗陽旅台同鄉會《棗陽文獻》編委李鑑瑞先生介紹了王杰先生的病情和家庭困難。李鑑瑞先生多年來支持離龍碑遺址發掘工作，與王杰先生建立了兄弟般的情誼，當他驚聞王杰先生患癌症等情況後，及時給予了經濟支援，仁義可風。

苗苗同志電話通知我，定於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廿九日上午九時，在北京協和醫院舉行悼念王杰先生告別儀式。我和李文烈同志遂於廿七日發出沉痛悼王杰先生並向其親屬表示慰問的唁電。電文如下：

唁電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並轉王杰同志親屬苗苗同志等：

驚悉王杰先生因患病醫治無效，不幸過世，深為悲痛。我們因事不能親自前往弔念，特委托棗陽市政府副市長邱光秀等同志，代表我們前往北京，參加王杰同志遺體告別儀式，並致電向王

棗陽文獻

杰同志表示沉痛哀悼。向王杰同志的親屬苗茜同志等，致以親切地慰問。

湖北襄樊市政協原主席

胡久明

襄樊市炎黃文化研究會會長

湖北襄樊市政協原副主席

敬悼

襄樊市炎黃文化研究會副會長

李文烈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廿七日於襄樊市

與此同時，我還建議棗陽市委、市政府、市文體局派副市長邱光秀等領導同志，代表棗陽市各級組織和我前去參加追悼會。並代我和李文烈同志向王杰同志敬獻了花圈。

我與王杰先生在棗陽雕龍碑遺址發掘和文化定位籌備研討會，以及襄樊市炎黃文化研究會的十八年交往中凝聚情感，結為摯友。他的逝世，使考古界失去了一位優秀的考古工作者，我失去了一位摯友和兄弟，失去了我們共同事業中的一

位忠誠戰友，因此，我感到萬分痛惜，我將永遠懷念他……

王杰先生鏗而不捨，執著追求，把畢生的精力獻給考古事業的崇高精神和高尚情操，贏得了廣泛而中肯的贊譽。故宮博物院原院長、史前考古專家、教授、博士生導師張忠培，滿懷深情地評價王杰先生：「看到他對棗陽雕龍碑遺址考古發掘、保護、研究工作，兢兢業業，殫精竭慮，作出了很多貢獻。我們為考古界有這樣一位同仁、一位朋友，感到由衷的驕傲！」棗陽雕龍碑文物管理處主任鮑明長說：「王杰先生把他應享天倫之樂的最美好的時光，都獻給了棗陽，獻給了雕龍碑遺址，獻給了崇高的文物考古事業，令人敬佩！」棗陽市委書記

岳興平、市長汪厚安在唁信中說：「王杰教授永遠活在棗陽人民心中！我們將永遠懷念王杰教授！」

